论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传统中国, 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之所以长盛不衰, 自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仁爱同情与慈悲为怀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情感动力, 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是慈善行为和事业的理性基础和道德实践, 而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则是传统慈善行为的普遍价值信念和赏罚机制, 三者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思想基础。在当前我们努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时候,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合理因素, 有助于推动现代慈善事业的进步。

关键词: 中国; 慈善事业; 思想基础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24X(2009)01-0001-03

近年来, 我国慈善事业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中, 全国上下全力救灾的壮举更是让我们感受到慈善事业的强大力量和价值。

在传统中国社会, 慈善行为和事业是受人尊重的事, “积德行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慈善事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传统中国, 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之所以长盛不衰, 自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今天我们努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时候, 批判继承这种传统慈善思想的合理因素, 将有助于现代慈善事业的进步。

所谓“慈善”就是指出于同情、仁爱的道德情感而怀有的有利于他人并帮助他人的善意和基于这种善意而采取的行为。正如唐代大儒孔颖达在为《左传·文公十八年》作注时所说:“慈者, 爱出于心, 恩被于物也”。这也就是说, 慈善不仅是一种爱心, 而且还是一种有恩于别人的善行。可见, 慈善是观念与行为的统一, 行为与事业的统一。它如果是一种个人的行为, 我们一般就称为“善举”、“高义”。而这种慈善行为如果是一定的群体坚持长期所为而不是一种偶然的行动, 那它就由行为的“善举”而变成一种社会慈善事业了。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慈善其基本特征和宗旨是以积德行善为目的, 而作为一种社会事业的慈善其基本特征是以调节、和谐、补救、福利社会与人群为目标的。因此, 它是以追求“公益”为其事业特质和价值目标的。

整合中国各个时代和各家学派的慈善思想, 可以概

括为下述几方面:

第一, 仁爱同情与慈悲为怀的思想感情。仁是中国传统道德即儒家道德的第一德, 仁者爱人, 爱他人被看作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精神源头。仁爱精神要求人们从亲亲开始, 而达到仁民, 最终达到爱物, 并认为人的其他道德都是从这种仁心中扩充出来的。孔子要求人们要“泛爱众”, “爱人者, 人恒爱之”, 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社会的精英分子, 孔子更是要求他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到了宋代哲学家张载那里则提出了“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的泛爱与博爱思想。墨家思想提倡“兼相爱, 交相利”, 墨子不仅强调思想上的兼爱, 还强调爱人必须体现为利人, 人与人之间应互帮互助, 不能损人利己, 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要“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又说:“财多, 财以分贫也。”(《墨子·鲁问》)换言之, 每人应发挥所长, 竭尽其能, 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帮助别人, 去实践“兼爱”的理念, 惟有如此, “则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乱者得治。”(《墨子·尚贤下》)由此可见, 墨爱的“兼爱”思想充满着乐善好施、广济天下的精神。墨子还提出若以“兼为正(政)”, 则“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 以终其寿; 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 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作为一个“兼士”(信奉并践行兼爱学说的人), 看到朋友饥饿, 就给他食物吃, 寒冷就给他衣服穿, 有病就前去照顾, 歿亡就为他入殓, 这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和扶困济危的精神风尚。后期墨

收稿日期: 2008-12-19

作者简介: 肖群忠(1960—), 男, 陕西彬县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研究方向: 伦理学与中国伦理思想史。

家著作《小取》中还说：“爱人，非为誉也。”这种施仁义而不图报恩者，其心其德弥足珍贵，更令人敬仰。墨家摩踵而利天下的精神对后世慈善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历史上，下层群众中互爱互助的行为从未停止过，一人有事，众人相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慷慨解囊，急公好义之士不绝于耳。儒家尚仁，墨家倡义，仁与义为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德目，因此才有“仁义道德”之连用，也才有唐代韩愈“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说法。可以说仁爱义行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另外，我们还要接着问，仁爱之心又产生于哪呢？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也就是说，同情心是产生仁的根源，这是人的“四善端”之一。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当人们突然看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孺子将要坠入深井时，心中就会油然而生怵惕、恻隐之心，自然就会出于同情而去拯救孺子于危境中，而这个同情心是一切善举的精神源头。由这种同情的“不忍人之心”就可以来怜惜生灵，把爱护生命当作至仁，把滥杀无辜当作非仁。我国民间社会的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的品质就是在这种仁爱同情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在佛教看来，人有无慈悲心是一个有无一点善根的关键，而能否做到“悲天悯人”、“大慈大悲”、“普渡众生”则是一个人格境界和能否成佛的标志。凡是信佛的人都须胸怀慈悲，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正如《大宝积经》里所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法华经》）佛教的这种慈悲为怀的精神与儒墨的同情仁爱思想相互支持，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同情心是促使人产生同情冲动和引发行善行为的根本动因，正是有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人才能去爱人，才能去扶危济困、救助弱者，才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休谟、卢梭也非常重视同情心对道德的重要作用，大量的道德事实表明，人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借助于心灵交感，而成为产生乐善好施举动的根本情感基础；很难想象患有良知麻痹的人，会成为慈善事业的热心人，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某些人是“麻木不仁”的人的原因。当代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缺乏人道主义的教育，优秀文化传统的失落和诸多复杂社会原因，导致了当代中国人们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即人们

对他人的疾病痛苦、身体残疾、生活困境甚至生命危机等缺乏应有的关注。要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就应该从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做起，因为慈善事业的基石正是人们的同情心和爱的道德感。

第二，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的道德要求。如果说仁爱、兼爱、同情、慈悲是中国传统善举和慈善事业的思想感情基础的话，那么，积善成德，见义勇为的观念则是鼓励人们从事慈善行为和慈善事业的观念基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慈善不仅是思想感情，而且也要体现为行动。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积善必然成德，一个在道德上追求完善的人，要不断地做善事，要时时处处多做好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要“分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梁惠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积善成德是传统中国人的一个深刻的价值信念，而有德之人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可以“仁者寿”、“智者乐”。佛教也要求人们多行善事，广种福田、布施施舍，乐善好施，济人贫苦，“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才能修得正果。道教《太平经》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对世俗社会也深怀仁慈爱意，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主张财物不应独占，应“乐以养人”、“周穷救急”，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1〕}

行善不仅是为了自己的道德完善，也是作为人的义务，慈善体现了这种做人的责任意识，扶危济困就是见义勇为，这里不仅是一种对他人的同情，更是一种自觉的道义担当。官府的救助，可能有“得民心”的政治考虑，宗教的救助也许是出于一定的信仰，但民间自发的救济则主要是一种“自任”的见义勇为。中国古代的慈善之举中，洋溢着这种“以仁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这一精神在历史上培育了无数慷慨之士，它是我们民族优良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为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第三，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的赏罚机制。慈善行为就其主动动机来说是无私利他的，是只讲付出，而不求回报的，是不含有功利目的的，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信仰和赏罚机制，在传统思想的儒释道各家中国都有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的思想，这种思想保证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能够长期持久地开展。德得相通，善恶有报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特点，在儒家经典《尚书·商书·伊训篇》中有言：“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传·坤·文言》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云“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庄子认为“为善无近名”，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高寿善终，可见，善恶自有报应，这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因而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的申述。如“积功累世，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等。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承负说”，这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会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负其善恶的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承负说”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人的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同时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提倡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承负说”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当然对于道教徒来说，唯有积德行善，才能成仙，这是更大的善报。到了宋代以后，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更是强化了这种神佑鬼惩的善恶报应思想，对老百姓的道德修

为和慈善行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为实现其劝善化俗的目的，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也称“果报论”。佛教认为：业有三报：一现报，现做善恶，现受苦乐。二生报，今生作业，来生受果。三后报，或今生受业，过百千生方受业。这种业报轮回说告诉人们，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成恶行，来世堕入地狱。这种业报轮回说，一经传入中土便同中国早已有之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因而使善恶果报理论更加丰富。佛教的“果报论”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唤醒了众多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使人们意识到“善恶报应也，悉我自业焉”，并且认识到“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行仁”。从某种意义上说，因缘业报说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并进一步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诸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劝善嘉言，妇孺皆知。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惧，人们注重自身的修养，广结善缘，尽量地积善积德，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

总之，仁爱同情与慈悲为怀是中国传统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情感动力，积善成德与见义勇为是慈善行为和事业的理性基础与道德实践，而福善祸淫与善恶有报则是传统慈善行为的普遍价值信念和赏罚机制，三者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行为和事业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王明. 太平经合校 [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60.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ar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XIAO Qunzh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charity has had a long history. Love, pity and kindness are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for people to show their love to the unfortunate. To show your kindness and make the justice done to favor the people is regarded as the morals can be the common values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All these make up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charity. Now,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morals so as to promote the charities in China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China; charity; ideological foundations